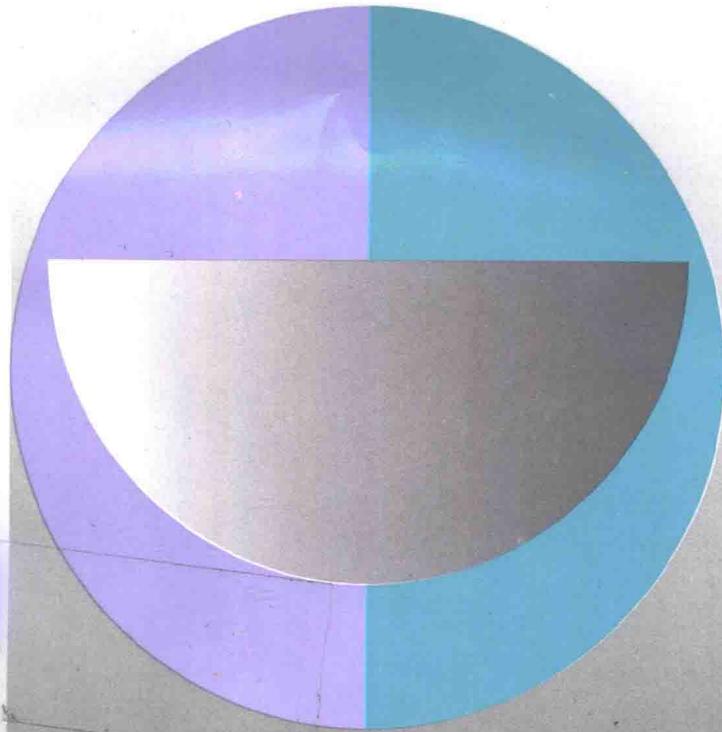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韩国研究论丛

(第三辑)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复旦大学
韩国研究中心编

韓國
研究
論丛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第三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 涛
封面装帧 陆素义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韩国研究论丛

(第三辑)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 插页 5 字数 234,000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08—02574—6/K · 624

定价 17.20 元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韩国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 庄锡昌

委 员 (按姓氏笔划排名)

石源华(常务)、朴昌根、任 晓

庄锡昌、周明伟、金光耀、黄美真

杨立强

本辑执行主编 石源华

特 约 编 审 许道勋

韩国学术振兴财团支援刊行

总序

中韩两国自1992年8月24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政治、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进展非常迅速。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两国人民在历史上就存在源远流长的密切交往；其二，两国毕竟是关系紧密的近邻；其三，更主要的原因也许是，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两国彼此都需要对方的友好合作与互利交往。

中韩两国都是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又紧密相邻。纵观五千余年两国关系史演变的全貌，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和睦友好的状态，在两国的文明演进过程中，相互都给予对方以许许多多积极有益的影响，促进了两国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繁荣。

在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交往中，我们可以发现，中韩两国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建筑风格，乃至思想意识形态诸方面都具有惊人的雷同之处。如果再作更进一步的探索，我们还会发现在两国人民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具有某种血缘方面的承袭关系。可见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多么密切，不同于一般。悠久的历史告诉我们，和睦相处、友好合作是两国人民历来的共同愿望，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近数十年来，勤劳刻苦的韩国人民奋发图强，努力发展经济，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创造出令世人赞叹的“汉江奇迹”。中国也于1978年底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中国人民正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经济的发展，以求早日实现经济的现代化。由于中韩两国具有极其类似的历史经历与文化背景，在实现

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会碰到许多惊人地类似的情况。韩国人民的经历，可以为中国人民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再者，在两国进一步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彼此又有可能提供多方面的互补互利性的帮助。尤其重要的是，在维护远东与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的过程中，中韩两国之间的合作与共同努力，亦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两国的合作将是一股有相当份量的稳定力量。

总而言之，历史的传统，现实的需要，都使得我们充分认识到中韩两国人民需要和睦相处、友好合作。和睦和友谊的基础是彼此了解，由深刻的了解进而达到彼此的真正理解。理解是友谊的基础。然而，过去有数十年时间，由于我们实行自我封闭的政策，使得我国的广大人民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情况知之甚少，或者说了解极其不全面。中韩之间更是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隔绝达三十年之久，彼此了解甚少，更谈不到相互理解了。

近十余年来，我本人主要致力于世界文化史的研究与传播。我这么做的目的之一，便是试图使我国人民有机会充分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世界其他国家人民所具有的不同于我国的文化背景，以求达到彼此之间的理解，从而促使中国人民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与各国人民友好平等相处。我认为，只有充分了解了其他国家的文化背景，才有可能全面地、完整地吸取别国人民的历史经验，以利于我们更顺利地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现代化的国家。

1992年10月，复旦大学成立了韩国问题研究中心，目的在于推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彼此了解，进而达到彼此深切理解。为此，我们聚集了校内外一批关心韩国问题的学者，一起来研究韩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外交、中韩关系等问题，并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积极支持下，出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以及《韩国研究论丛》。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有助于中国人民全面地了解

韩国人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我们也将努力做一些工作，向韩国朋友介绍中国，使他们能全面地、完整地了解中国人民，理解中国，从而使得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建立在牢固稳定的基础之上。

理解与友谊——这就是我们出版这一套丛书的基本宗旨。

庄锡昌

1994年11月5日

目 录

总序

庄锡昌

对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社会——文化分析：韩国的经历

..... [韩]朴永信(1)

转型中的韩国政治 [韩]韩升洲(16)

韩国政治革新的深层剖析 崔志鹰 徐漪(28)

论韩国地方自治 任晓 [韩]陈彦希(40)

东北亚战略四边形格局与朝鲜半岛统一问题 郭学堂(50)

80年代韩国反美主义初探 王春来(67)

外国资本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王文政(83)

韩国金融市场与企业投资的研究

..... [韩]黄义珏 朴昌根 [韩]全哲秀(108)

朴正熙政权的农村开发政策研究 任贤胜(133)

浦项制铁公司的形成及其管理经验 杨小川(149)

评中国国民政府对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所持的态度

..... 吴景平(163)

宗教、民族主义和国家政策：

日占时期韩国基督教与神道间的冲突

..... [英]金正玄(201)

巨文岛事件与朝鲜的国际环境 戴鞍钢(219)

高丽忠宣王西谪事件考析 王 颀(228)

朝中图书交流瞥见 [韩]李元淳(245)

高丽本《孝行录》与“二十四孝” [韩]金文京(273)

高丽时期的中国“投化人” 卞元珪(288)

附录：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大事记

(1995年7月—1996年6月) 华 磊(301)

对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社会 ——文化分析：韩国的经历

[韩]朴永信

众所周知，在40余年时间里，韩国经济有了重大的增长。与50年代和60年代初相比，各主要经济指标都有了显著增加，例如，人均收入从1954年的80美元，1962年的96美元，1979年的1662美元，提高到1987年的近3000美元。尤为重要的是，国民总收入增长率平均每年为10%，与此相应，农业人口和播种面积明显减少，工业部门雇员数和产量增加。1953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2%，但到了1983年，这一比例下降到32%，同年制造业人口增加到50%。随着工业的增长，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另外，总人口中绝对贫困者从1965年的40.9%下降到1980年的9.8%^①。这一经济奇迹使许多评论者不再使用“第三世界”一词，改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并且使用了“四小龙”（或四小虎）一词，即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这是一个褒义词，而中国通常被视作巨龙。

许多评论者试图探究韩国经济增长之谜。在世界银行、韩国发展研究院和其他政府及半政府机构的研究报告中，几乎所有的分析者都限于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分析。近年来人们通常认为经济发展加强了政治和经济的互相依赖，但是，少数研究者试图从经济领域之外寻找原因。对于韩国的成功，仅仅研究资本形

成、进出口贸易、政府政策和投资等等,是远远不够的。对这个复杂的过程,绝不能仅限于经济分析。

我们必须考察与韩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一文化因素。这是因为,经济与相应国家的特点以及特定时期的情况变化相联系。例如,经济的增长,包括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技能的提高,都有赖于韩国采用技术的能力,通过商业、政治、文化等交流获得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进行竞争的能力,这些能力都与文化有关。所以,人们必然会提出如下问题:韩国究竟具有什么人力资源,他们是如何取得巨大经济增长的^②。正如社会科学必须认识到文化对于发展理论的重要性,理解韩国的经济成功,必须考察其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传统。

本文将讨论社会价值观和当今韩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传统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得到运用。在什么程度上和为了何种理由,价值观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呢?显然,韩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之一,是其社会一文化特点,亦即为了发展经济而获得民众支持的能力。

一、基本的社会价值观

在韩国,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并不是某种宗教的伴生物或突然形成的,而是历史上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产物。与其他社会一样,韩国的价值观有其漫长的形成过程,而且肯定早于高丽时期,当时佛教是社会生活的主要部分。可以肯定地说,在朝鲜时期,随着儒学的制度化,韩国基本价值观已经大体上确定。所以应对朝鲜时期作一考察^③。

首先应当指出,朝鲜时期儒学信条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虽然本国固有的文化观和宗教传统依然存在。儒学权威性的获得,与朝鲜王朝建立后对儒学的扶植有关。当然,儒学的制度化

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人们的行为也并不完全符合儒学的价值观。但是，朝鲜王朝初期的社会精英承担了阐述和传布儒学信条的责任，与此同时，也得以光大儒学的价值观并使之制度化。于是，儒学价值观超越了传统社会的其他观念，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并决定着其他社会标准。

韩国社会的传统道德规范可归之为“五伦”，它规范着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这五种关系。除了君臣和朋友外，儒学原则规范着家庭关系。虽然在任何宗教传统中家庭都占有中心地位，但儒学传统赋予家庭关系在道德规范中的特殊地位^⑤。朝鲜时期的儒学精英，都强调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协调平衡，但他们都认为家庭和家庭关系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儒学的某些派别主张“君、师、父合一”，旨在强调政治、教育、亲族领域中道德义务的并重，尽管在家庭中对父亲的服从要超过对其他社会关系的伦理义务。家庭之外的伦理义务，无论从紧迫性还是从程度上而言，都比不上孝道。在同对政治秩序的服从相比时，这一点更明显。在讨论王权的政治合法性时，通常强调“君主必须尊重民意”的传统原则，这一原则十分接近儒学中的“民为国本”。“民本”的说法通常会使人认为传统儒学中有着民主的思想。然而，即使是对最高政治当局即君主的义务，也及不上孝道；与政治团体相比，家庭得到更大的重视。

这一观点体现在朝鲜王朝初期的重臣郑道传的著作中，他描述了国家结构、权力关系的基本模式，以及社会的和政治的过程，表达了朝鲜王朝尊崇儒学、鄙视佛教的政策。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孝道被视作所有行为的规范和一切教育的目的；孝道和家庭的最高社会价值便是所有儒学思想和价值观的主题。传统的主流派和所谓的实学派均持上述观点。应当指出，上述价值观的正统化，反映了精英们试图将其植入行为规范并为民众所接

受,使朝鲜王朝作为儒学社会而合法化,进而成为邻国的道德楷模。儒学关于社会关系的规范,如忠、孝、悌、信、义,特别受到年长儒士们的推崇,从而成为被统治的民众的所谓美德。

宗教和伦理的价值观的地位,集中体现在亲族关系中,并因家庭这一概念而得到强化;而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官僚结构和教育过程,实际上又成为这些价值观的基础。宗教和伦理的价值观发展与渗透到社会各领域的儒学观点,包括社会秩序、责任义务、教育制度等方面。换言之,一切社会领域都有着表示其合法性的宗教含义。事实上,宗教和非宗教已经没有明确的界限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传统韩国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已经被“融合”了^⑤。当然,朝鲜时期国家机构和社会关系的实际运作并不理想化。由于社会各阶层地位的重新整合以及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传统的社会构架逐步崩溃。到了朝鲜王朝后期,尽管政府实现了改革,社会不满却日益严重。在文学、思想、宗教等领域,新的社会运动以各种形式勃兴。改革思潮、西方学说、启蒙思想和基督教的出现,冲击着传统社会。在社会精英和不满的民众之中,正酝酿着一场重大的社会运动^⑥。但是,他们都保持着儒学的价值观,儒学仍被认为体现着理想的、自然的社会力量。

几个世纪以来,儒学价值观主导着社会行为和社会生活。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有助于个人和团体对付紧张困难的处境,特别是在工业化进程中。这些价值观规范着人际关系和行为准则。家族的重要性超过其他社会关系,但与此同时并不破坏整个社会的平衡。家庭被认为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它最能激起人们的道德义务。因此,维系家庭并实现相应的目标,要比国家的和其他非家族的目标更能受到人们的关注。

二、文化资源和经济行为

在韩国，传统的社会价值观（特别是关于家族问题）的重要性明显超越其他社会领域。因此，我对于有关家族的观点和概念，以及它们对今日韩国的影响，颇感兴趣。以下的讨论并不涉及特定的家族问题，而是就普遍的和历史的意义，探究家族对于韩国社会的稳定和变化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近代韩国的历史，是大国为控制韩国而争斗的历史。19世纪后期，朝鲜王朝放弃了孤立主义政策，旋被卷入国际冲突，最终于1910年被日本吞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韩国重新获得独立，但却被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分别为苏联和美国军队所控制。1950年韩战爆发，整个半岛经历了3年的浩劫。本文述及的经济增长，就是与南韩的复兴和发展密切相关。

近代韩国的动荡还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与经济发展不无联系。例如，旧王朝的社会等级制度瓦解，仕途不再为“两班”所独占。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向社会大众敞开了教育之门，激发了公众对教育的积极性。对教育的重视与关注社会进步的意识有关，而这种意识是建立在传统的家族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尽管旧的社会结构已经瓦解，但在安排个人的重大社会行为时，家族仍然发挥着作用。普通民众以往未能接受正规教育，但是，对于家族的义务和责任却是超越时代的，它促使家族成员在一定的条件下为家族尽力。而正规教育的普及，通常把对家族的义务和责任推及更广泛的公众领域^⑦。在美国教育的平均主义观点的影响下，韩国的教育改革成为重新构架社会关系的开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家族成员将其义务和责任推及社会领域。

与教育的普及相关，对社会成员参政的障碍也减少了，政权

回到了韩国人民的手中。从整体而言,国家日益成为自由公民的联合体,并且仿照美国的民主模式发展政体形式。这一过程同教育的发展是并行的。政治的开放是政治发展的必要条件,尽管只是形式上的民主,作为独立的国家,韩国毕竟经历了民主思想的洗礼和改革。朝鲜时期的教育制度曾使儒者入仕。在日本统治时期,以往由“两班”把持的权力结构未经政治和社会的改革而保留下来。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后,政府进行了民主改革,政治不再是贵族以及少数与日本合作的韩人的独占领域。特别是1990年之后,对全体国民而言,参政第一次具有了现实可能性。这为韩国所有的社会阶层提供了推动社会进步的机会。在传统社会中,宦途是最高的取向;而一旦对公众开放,只是为了从整体上加强政治性。至于儒学价值观,许多韩国人仍认为它对于社会和政治领域具有支配作用。在参政问题上排除了传统的和殖民地的障碍之后,韩国国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试图通过进入最好的学校而在政府中谋得职位。

与二战后新获得独立的许多其他前殖民地国家相比,韩国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也力图摆脱殖民地的以及本土的专制主义的影响。然而,当人们意识到振兴国家的曲折性和新政府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的有限性时,对于独立的欣喜很快便消失了。韩国一度只是服务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向日本输出原料,同时是日本产品的市场。按照诺曼·杰克伯的说法,韩国只是“近代殖民地性质的不发达的经济”^⑩。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民来说,独立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下降而不是提高^⑪。韩国刚从最残酷的压榨下摆脱出来,它的经济振兴十分困难,而韩战更使之雪上加霜。

韩国面临的困难似乎是难以克服的。但是,新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使它能够推行自己的经济政策,这一体制不再服务于政治压迫者或经济剥削者。该体制是美国军政府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倡立的,它有助于摆脱困难,动员韩国人民发展经济,而

过去他们几乎没有经济成功的可能。

政治体制的改变，有助于动员巨大的潜力投入经济活动。但与此同时，韩战结束后头几年的政治困难、混乱、人口增长和食物短缺，阻碍了经济的增长。最大的政治改革成果是新共和国的建立，尽管需要采取可行的具体政策。只有知道了上述这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只是从 60 年代中叶起，即 1961 年军人集团推翻了民主政府之后，才开始实施可行的经济政策^⑩。

军人集团确实希望发展国家经济。他们宣传夺取政权是为了帮助人民摆脱贫困。他们把种种低效和腐败归之于旧政治和政客^⑪。同绝大多数军人政权一样，军方领导人不喜欢民主政体和民主进程，他们向往效率和擅权。他们关注的不是政治发展，而是国家经济能按自己的道路发展。他们是军方的专家治国论者，曾经在美国军事院校接受有关近代管理的教育和训练。军事政权把经济目标置于政治之上，他们甚至宣称，对于一个资源缺乏的国家来说，基本的民权只是一种奢侈，尽管在经济发展的西方民权也许是必要的。军方领导人向全体国民许诺经济利益，他们把发展经济视为神圣的思想，认为是社会唯一的目标。

军人政权常以发展经济的目标为借口，否定基本的政治权利。这一说法往往能论证其政权的合法性。事实上，军人政府一度获得了国民的信任和支持。显然，历经战争磨难的国民，无论贫富，都意识到确保物资供应和经济繁荣的重要性。但是，仍有许多人在考虑着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尽管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欲望超过以往，但并不能说这种欲望已成为价值观的主体。与此相反，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和发展经济的目标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事实上，儒学的观点已从教育和政治领域延伸到经济领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固然与人们从事经济活动、追求更大的利益相连。作为家族，其价值取向不仅在于投入经济活动，而且希望整个经济的繁荣。军人政府获得相

当部分韩国国民的支持,这决非偶然。这种支持正是如下社会价值观的本质体现,即强调为家族而工作要重于一切。与此相应,通常认为各个社会成员应该为改善其家族的社会地位而全力以赴,并为各自家族的荣誉和利益而互相竞争。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军人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基础。

据上所述,韩国经济的发展同本国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并不相矛盾。而通常认为,非西方社会在探寻工业化之路的过程中,往往与其文化传统相冲突。韩国的经验无论在理论上还在实践上,都有其特殊性。在韩国,社会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政策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60年代末和70年代,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曾经提出“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工作”的口号,该口号的含义实际上是“为你的家庭幸福而工作”,并且激发了与家族观念密切相关的巨大的工作积极性^⑨。

在大多数新发展中国家里,制造业雇佣着大量的女工,她们工资低微,工作时间却很长。毋庸讳言,这正是维持经济增长率和使“经济奇迹”成为可能的基础。在迅速工业化的年代里,许多女工来自农村地区^⑩,她们通常声称是“为了帮助(她们的)兄弟继续上学”^⑪。在有关女工的自传性作品中,也可以发现同样的说法。这表明,许多女工和其他人一样非常向往学习,但她们受教育的机会仍然受到性别的极大的限制。女工自我牺牲或受压迫的事例是哀婉动人的,这表明她们是十分看重家族的。

与上述事例同样能够说明文化传统影响力的,或许是人口计划政策。这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西方国家常常警告说,不发达国家资源有限但人口过多。但是,韩国却通常被视作“家庭计划”成功的范例^⑫。文化传统在这方面起了作用。在全体国民中推行家庭计划政策的过程中,政府不可避免地面临传统的家族价值观,即极为重视子孙后代特别是男孩^⑬。但是,家庭计划政策最有效的一点是尊重传统的家族价值观,呼吁为了家庭的